

# 韦伯的大学观

## ——《以学术为业》研读

祝 贺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以学术为业》是马克斯·韦伯一篇著名的演讲稿,不仅展现了20世纪前后德国大学面临的难题与危机,还深刻阐发了马克斯·韦伯的大学观。韦伯一方面看到官僚化对德国大学学术自由传统的破坏,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这种趋势的必然性,他呼吁教师做到价值中立,认识到理智化过程的两面性,积极承担起自己的学术职责,实现自己内心的积极自由。韦伯的大学观实质上是现代性中的大学如何维护学术自由的问题,对当今的高校管理工作者和教师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学术自由; 理性化; 官僚化; 价值中立; 学术职责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09)03-0076-04

### 一、马克斯·韦伯与《以学术为业》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德国著名学者、社会学家,宗教社会学、法制社会学的创始人,与卡尔·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称三大古典社会学家。韦伯是一个通才,研究领域遍及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经济

学等等。《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是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其晚年的1篇演讲稿。正如《以学术为业》的题目一样,他终其一生都在从事学术研究。1864年,韦伯出生在图宾根地区爱尔富特城一个有名望的富裕之家。1899年,韦伯以论文《中古商社史》获法学博士,1891年以论文《罗马农业史在公法及私法上的意义》获大学教授资格,1892年接替导师在柏林大学担任教职<sup>[1]</sup>。1894年,韦伯应聘到弗赖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两年后又转往海德堡大学任教。由于健康原因,韦伯于1903年辞去教职,成为名誉教授。但他一直没有停止著述。1919年,韦伯前往慕尼黑大学讲授“社会经济史”课程,《以学

术为业》就是1918—1919之交的冬季<sup>[2]</sup>,韦伯对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发表的两篇演讲之一。另一篇演讲题为《以政治为业》,两篇合称《学术与政治》。韦伯于1920年6月14日因病去世。韦伯一生著述颇丰,其中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经济与社会》等最为重要<sup>[3]</sup>。

《以学术为业》的发表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870年德国统一,经济迅速发展,政府逐步加强对大学的干预,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学几乎完全沦为政府的工具与附庸,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传统受到严重破坏,大学领域逐渐产生官僚化现象,政府对大学教师人事权的干涉导致了学术自由的丧失。此外,经济的腾飞、科学理性的发展导致了人们价值感的丧失,启蒙运动以来欧洲精神文明的主旋律至此已遭颠覆,大学官僚化的过程使得许多大学教师找不到从事学术工作的崇高意义,消磨了捍卫学术自由的勇气与责任感,争名逐利、屈从专制、趋炎附势而浑然不觉,还幻想着学术自由会在这种体制下存在。韦伯一方面不满于官僚化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破坏,另一方面也看到官僚化趋势的必然性。同时,他还不满于德国大学传统的教授自治,他认为美国的大学体制更有活力,更能促进学者之间的竞争。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情,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深刻地阐发了他有关大学的一系列

收稿日期: 2009-03-07

作者简介: 祝 贺(1986—),女,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

观点,表达了他深深的忧虑、对一个失去的时代的怀念,同时也寄希望于青年一代,希望他们能够“以学术为业”,认同学术的这种宿命,积极承担起作为一个学者的职责,实现内心积极的学术自由。

## 二、韦伯的大学观

### (一) 大学自治与官僚化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韦伯在研究大学问题时始终关注着大学的体制问题。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德国大学的一项传统,但在韦伯所处的时代,这种传统却受到官僚化的破坏。首先,官僚化通过大学教师编制方式的变化来干涉大学的自治。韦伯首先是通过美国与德国学术生涯外部环境的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在德国,进入科学研究领域是从担任编外讲师开始。如果一个人想从事学术研究的事业,首先要征得某大学里本学科专家学者的同意,提供一本著作,经过形式性的面试,才能担任编外讲师。编外讲师可以按照自己的特长开课,但他没有固定的收入,只能靠学生的听课费为生。德国的编外讲师一旦获得职位,就是终身性质的,没有人可以随意解聘他。随着任教年限的增长,德国的编外教师会凭借资历获得一些利益。而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先成为一名助教,其中只有一部分助教能够获得编外教师的正式职位,并且这种机会通常来得很晚。美国的助教必须能够招徕众多的学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助教就有被解聘的危险。但是,美国的助教有固定收入,尽管工资很微薄。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助教在获得教职的同时也获得了稳定的生活保障。德国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还在另一方面与美国不同:德国的编外讲师实际讲的课比他希望的要少,而美国的年轻讲师则处于超负荷的工作当中。在韦伯看来,德国传统的编外讲师制度有利于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但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编外讲师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大型的医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研究机构的存在依赖于大量的经费,助教依赖于机构负责人,这种资本主义官僚化的趋势已在一些学科出现,并且在不断地蔓延。

其次,官僚化还通过直接控制大学教师职位的人事权来削弱大学的自治。韦伯以“阿尔特霍夫体制”(System Althoff)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是干涉大学任命教师的自由。按照从19世

纪建立起来的惯例,德国大学的教授任命通常是由校方从编外讲师中挑选候选人,列出名单,呈送给政府中负责相关事宜的部长,再由这位部长决定任命那位候选人,而非由大学管理机构直接任命,而20世纪初的德国已经普遍出现基于政治目的来任命教授的现象。第二是干涉大学教师在不同大学间流动的自由。在“阿尔特霍夫体制”下,政府要求新聘任的教师在一份保证书上签字,拒绝来自其他州的大学的招聘。这就限制了教师在大学间的自由流动。韦伯认为这种体制是把新一代的学者变成学术“生意人”,变成只会专心于捞取职位的人,他们将成为大学官僚体制中的螺丝钉,没有自己独立思想和人格。第三是干涉不同信仰的教师申请教授职位的自由。第四是阿尔特霍夫体制不能保证大学教授的终身教职。这个体制要求人们“保证同意教育部对柏林或其他大学正教授职位因为死亡等原因而空缺的状态不作预测的说明,还有要求教师履行默守秘密的义务”<sup>[4]51</sup>。而大学中只有正教授死亡或预备退休才能空出岗位,因此,这对于即将任职的教师来说实质上就是“事先随便支付的空头支票”。

### (二) 大学教师的学术职责

既然官僚化的过程使得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已经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异化”,那么大学教师应该怎样做,才能为学术自由争取到一些地盘?这就涉及大学教师的学术职责问题。韦伯认为,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就要树立一种崇高的责任感,把从事学术作为自己的志业,乃至天职。在韦伯看来,科学化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了几千年的理智化的过程。随着理智化的逐步加深,人们越来越相信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只是对客观实际的逼近,而不能提供给我们世界的意义。因此,“这种从理智化中自我解放的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同那些以此作为追求目标的人所希望的正好相反。”<sup>[5]33</sup>

这个过程对于学术具有双重性的影响。一方面,理智化促进了学术的专业化,使人们能够有能力和信心在特定的领域里取得成就;并且,理智化使得人类文明被嵌入永恒进步和无限之中,任何人都不会达到学术的最高点,“每一次科学的‘完成’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sup>[5]27</sup>。在这种不断的超越之中,学术才会走向更进步,人类才会走向更文明。这就是学术的命运,也是学术的意义。但在另一方面,理智

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为世界除魅”的过程<sup>[5]29</sup>,巫术、宗教神学失去了它们往昔的地位与号召力,工具理性占了主导地位。以前人们生活在一个意义世界中,人们怀着极其崇高、神圣的终极追求来从事学术,比如“通向真实存在之路”、“通向艺术的真实道路”、“通向真实的自然之路”、“通向真实的上帝之路”、“通向真正的幸福之路”等等<sup>[5]34</sup>,但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学术领域剩下的只是束缚感、疲惫感和无意义感。但韦伯认为,学者可以在内心为自己营造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为自己的学术工作寻找意义。把追求学术作为终生的追求不仅是学者的学术职责,更是一种“责任伦理”,教师应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sup>[5]23</sup>。以学术为命运,以学术为天职,对学术充满深沉的热爱和冷静的激情,甘于寂寞并乐在其中,具有一种独特的“迷狂”般的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sup>[5]24</sup>,这样才能获得自由,一种源于内心的学术自由。

### (三) 价值中立

“价值中立”是韦伯在社会学领域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主要是指研究仅仅是对客观现实的深入“白描”,而回避与价值判断有关的问题,不借科学研究鼓吹自己的价值观。韦伯在阐述他的大学观时再次提到价值中立,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这样的观点,认为大学不能只让学生获得知识和智力上的提升,还应该塑造人格、传授观念,给学生提供一种世界观、一种进行价值判断的立场。与此相适应的要求是,教师不仅要在知识和智力上给学生指导,还要为他们确立目标,指引人生方向。与这种社会上的普遍意见同时产生的是,政府对教师的自由进行控制,大学中存在思想压制。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把教师(尤其是编外教师)的言论置于政府的特别控制之下,教师不能发表政府不喜欢的言论,即使是在公共集会上。韦伯对此感到十分不满。对于学术,韦伯持“科学学术观”,他认为:“科学能提供的仅仅是分析那种需要及其本质,既不能证明也不能驳倒的终极的信仰的依据和价值判断,通过科学的手段可以讨论它们的历史根源或更加深远的‘真实感’,还可以分析为了实现这种需要实践的先决条件、分析当前潮流是否正按照他们的愿望向何方向演进及其原因——帮助他们进行经验主义的理解。”<sup>[4]33</sup>在韦伯看来,大

学应做到价值中立,对事实及其条件、法则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做出分析,但不涉及“对国家怀有敌意”或“对国家怀有好意”的观点,不进行政治调教或信仰灌输。对于大学教师来讲,做到价值中立就是在讲课时只教给学生事实,而不涉及党派政治、价值信仰,也就是韦伯所说的“讲坛禁欲”,“不在讲台上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将任何态度强加于学生”<sup>[5]37</sup>。至于那种不动声色的“让事实说话”则更加可耻。在课堂上,学生只能保持沉默,教师听不到批评意见,教师如果利用这样一种优势去向学生“兜售”自己的政治见解或宗教信仰,那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因此,党派政治不属于课堂,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教师只能教给学生已经定论的知识,教给学生方法,至于价值判断的问题则留给学生自己,教师只需扮演好传授知识的角色,而不能成为行动领域的领袖。在韦伯看来,“价值中立”是学术自由的保障,当学术自由受到外部强权的过分干预时,学者就可以用价值中立来抵制强权;当学术自由变成教师对学生的一种思想强制时,价值中立就可以牵制教师,使“教自由”不致越界的同时也保护了学生的“学自由”。

## 三、现代性中的大学观

现代性(Modernity)是指一种充满不安、面对现实的关系方式,是寻求一种对不安的答案<sup>[6]</sup>。韦伯所处的时代,正是德国大学体制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韦伯的这篇《以学术为业》就是建立在对现代性,尤其是学术领域的现代性的深刻认识之上的。一方面,韦伯不满足于传统德国大学中行会式的教授自治,认为这种制度下的学术自由是没有竞争力的,他看到了官僚制下的美国大学的生机与活力,“美国的大学以一种相当无情的方式与它们的同类竞争”<sup>[4]40</sup>;但韦伯同时也看到了深刻变革下德国学术自由传统受到的破坏,几千年的理智化过程使得世界祛魅,原本充满神圣感、意义感和价值感的学术工作成了技术理性的天下,官僚化和分析方法使得学者“非人格化”,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与尊严,成为庞大的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毫无自由可言。韦伯承认现代性将像“铁笼”一样笼罩着学术界,但作为一名深受新人文主义思潮影响的学者,韦伯始终保持着他心中理想的大学观,没有放弃对学术自由的追求。韦伯意义上的学术自由主要是指:“一,审批谁有



资格登上大学讲台的时候,不能以任何信仰上的理由进行歧视、区别对待;二,即使在大学以外的公共场所从事政治活动,并不于其教师职业有碍;三,在大学讲坛上讲课必须对自己的价值观、信仰有一定的自制——即所谓的‘讲坛禁欲’。”<sup>[4]</sup><sup>140</sup>他要求学者(尤其是刚入职的教师)把学术作为自己的志业、乃至天职,忍耐、献身、富有热情、甘冒风险,以一种悲剧精神承担学者的职责,认同这种宿命,在内心为自己营造一个意义世界,实现自己内心的自由,一种充满神圣感和崇高感的积极的学术自由。

韦伯虽然离开这个世界已有80多年,他的大学观中也存在着自身的矛盾与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社会仍然处在不断的变化和改革中,什么样的大学才是最理想的,怎样实现现代社会中的学术自由仍然是当今学者面临的一大问题,韦伯的大学观对于我们来说仍有很大的启示作用。韦伯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教师的学术自由是大学发展、创新的必备条件,而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为了学校的发展,也必然会对教师的选聘、晋升、授课等做出一些制度性的规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因此,如果大学和教师二者都追求自身意义上的绝对自由,那么势必会造成一定的矛盾。这也就是说,作为教育管理工作,应该尽量处理好大学自身的利益和教师的学术自由之间的关系,尽量营造一种宽松、自由的氛围,通过立法、制度等手段来保障教师的各种权利,保障教师的学术自由。大学教师也应该在考

虑自身学术自由的同时考虑到学校整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把自己的学术自由规范在合乎法律、合乎道德的范围内。另一方面,韦伯认为学术自由的获得主要通过大学教师内心对意义世界的构建,以神圣的责任伦理来承担学术“天职”,这一点对于今天显得格外有意义。经济的发展、竞争的激烈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使得许多人丧失了潜心研究学术的耐心和意义感。对于当今的大学教师来讲,应树立起崇高的价值理想和志向,不为外界的浮华与喧嚣所动,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寻找一份确定性,多一份踏实,多一份执著,专注地从事自己的学术工作,实现自己内心的积极自由。

### 参考文献

- [1] 玛丽安妮·韦伯. 马克斯·韦伯传[M]. 阎克文, 等,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189.
- [2] 钱永祥. 韦伯作品集1:学术与政治[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77.
- [3] 莱因哈特·本迪克斯. 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M]. 刘北城,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
- [4] 马克斯·韦伯. 韦伯论大学[M]. 孙传钊,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5] 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M]. 冯克利,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 [6] 达尼洛·马尔图切利. 现代性社会学[M]. 姜志辉,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1.

(责任编辑 朱漪云)

## Weber's View on Universities

—A Careful Study of *Wissenschaft als Beruf*

Zhu He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Wissenschaft als Beruf* is a famous lecture made by Max Weber. It not only describes the problems and crisis confronting German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20th century, but also makes clear Weber's view on universities. While realizing the damage of bureaucratization to the tradition of academic freedom in Germany, Weber also realized the inevitability of this tendency. He wanted the teachers to achieve value-neutrality in the teaching area, to recognize the dilemma of rationalization, and to take one's own academic responsibility, and achieving scholastic inner "positive freedom". Weber's view on universities is a problem of modernity, and it is meaningful to today's college managers and teachers.

**Key words:** academic freedom; rationalization; value-neutrality; bureaucratization; academic responsibility